

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社会时间的频谱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乔治·古尔维奇 著
朱红文 高 宁 范璐璐 译
金梦兰 朱红文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社会时间的频谱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乔治·古尔维奇 著
朱红文 高 宁 范璐璐 译
金梦兰 朱红文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社会时间的频谱 / (法) 乔治·古尔维奇著; 朱洪文, 高宁, 范璐璐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时空社会学译丛)
ISBN 978-7-303-11104-6

I. ①社… II. ①乔… ②朱… III. ①时间哲学—研究
IV. ①B0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474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5.125
字 数: 12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姚斯研 王 强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序

用一整套丛书来介绍“时空社会学”，无论是对广大读者还是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等专业领域的学者来说，都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其学术和社会意义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的确，尽管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时代（时期）、区域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把时间和空间看做社会学的主题，甚至把“时空社会学”看做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在中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理论领域还是需要加以论证的。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做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看做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社会科学家只有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 19 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做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

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做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

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3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一个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

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景天魁 朱红文

2008年11月29日

英译者序言

美国社会学家所认识的乔治·古尔维奇，只是《20 世纪社会学》(*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的编者之一和《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 的作者。而在法国，他却是著作等身，享有盛名。其最初的作品是 1932 年的《社会权利思想》(*Idée du droit social*) 和《当今时代与社会权利思想》(*Le temps présent et l' idée du droit social*)，随后又出版了《司法经验与权利的多重哲学》(1936) (*Expérience juridique et philosophie pluraliste du droit*)、《理论伦理学与道德科学》(1937 年，1961 年第三版) (*La morale théorique et la science des mœurs*) 和《社会学文集》(1938 年) (*Essais de sociologie*) 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的《当今社会学的使命》(1950 年，1963 年第三版两卷本)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社会决定论与人的自由》(1955 年，1963 年第二版) (*Les déterminismes sociaux et la liberté humaine*)，两卷本《论社会学》(*Traité de sociologie*) (1958) (他指导该书的写作并作出重要贡献，1963 年第二版) 和最后的《社会学与辩证法》(1962) (*Sociologie et dialectique*)。另外，他在索邦大学的许多课堂讲座内容也得以付梓，如关于圣西门 (Saint-Simon)、孔德 (Comte) 和蒲鲁东 (Proudhon) 的社会学理论的讲座以及《社会阶级的概念——从马克思到今天》(1954 年，1960 年第二版) (*The social class concept from Marx till today*)。这些著作先后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语、塞尔维亚语和日语。

乔治·古尔维奇 (Georges Gurvitch) 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的重要

人物之一。^① 人们一直认为他是社会学形式主义 (sociological formalism) 的现象学分支的领军人物,^② 但是, 古尔维奇自己更希望人们把他看做辩证实证论、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代表。“我从来都不是胡塞尔 (Husserl) 现象学的拥护者, 事实上, 我一直都强烈地反对它。我的深度层面 (depth levels) 源自蒲鲁东、马克思和伯格森 (Bergson)。而且,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相反, 形式主义一直都令我感到厌恶和恐惧。德国的影响源自费希特 (Fichte) 的第二个时期, 也就是他转变成一个实在论者之后, 源自马克思、舍勒 (Scheler)、拉斯科 (Lask) 和哈特曼 (Hartmann) ……这些更为近代的实在论者。为了避免误解, 我已经开始用社会交往的表现 (*manifestations of sociability*) 来代替社会交往的形式 (*forms of sociability*)。”^③

乔治·古尔维奇 1894 年 11 月 2 日出生于俄国的新罗西斯克。他就读于彼得格勒大学, 并于 1917 年被这所大学任命为助理研究员, 1919 年晋升为讲师。同年, 他被任命为托木斯克大学教授, 但是, 他拒绝了此次任命。1920 年, 他离开了俄国。1921 年, 他被聘为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大学俄语部教授。他在那里待了三年, 此后移居法国, 并于 1928 年获得了法国公民资格。

从 1927 年到 1931 年, 乔治·古尔维奇在巴黎授课, 起初是在巴黎大学的斯拉夫学院, 后来是在索邦大学。1932 年, 他被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他还被任命就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塞维涅学院 (*Collège Sévigné*), 担任过波尔多大学的名誉教授, 并接替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正教授 (1935—1948 年)。

① Don Martindale, *The Nature and Typ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Mass., 1960. pp. 276 ff; René Toulemont, *Sociologie et pluralisme dialectique dans l'œuvre de Georges Gurvitch*, Éditions Nauwelaerts, Louvain, 1950; T. Nogouti, *Étude de la sociologie de Gurvitch*, Tokyo, 1961 (日文); Joseph Gugler, *Die neuere französische Soziologie*,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Neuwied, 1961, pp. 110—134.

② Don Martindale, 同上书。

③ 引自乔治·古尔维奇 1963 年 10 月给 M. Korenbaum 的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访问了美国并加入了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行列，帮助成立了受自由法国临时政府（Provisory Government of Free France）资助的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 de New York*）。他组建并领导该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在美国期间，他还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学者、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法国区域研究教授。最后，他以哈佛大学客座学者的身份结束了美国之旅。

1945年，他返回法国，在出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的同时，领导由他在巴黎建立的社会学研究中心。1948年，他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文学和人文科学学院的正教授，接替了最初由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出任的席位。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研究主任（第六分部）。

1946年，乔治·古尔维奇创立了《国际社会学手册》（*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该期刊截至2010年已经发行了36卷。他同时还负责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的“当代社会学书库”（*Bibliothèque de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这一丛书的指导工作。从1960年到1963年，他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社会学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1962年，他被选为法语学者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of French Speaking Scholars）主席。

1917年，乔治·古尔维奇写了他的第一篇俄语论文，主题是关于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接着在1942年他又用德语写了一篇关于费希特具体伦理学体系的论文（*Fichtes System der konkreten Ethik*）。在法国，他对涂尔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和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以及莫里斯·哈布瓦赫一同讨论和工作。他的特殊兴趣一方面把他引向圣西门、蒲鲁东和马克思；另一方面又将他引向伯格森、奥里乌（Hauriou）、舍勒和拉斯科。他在索邦大学的讲座（1927—1931年）最初就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其思想倾向于舍勒、哈特曼和拉斯科等实在论者。这些讲座收录于《德国哲学目前的趋势》（*Les tendances actuelles de la philosophie allemande*, Paris, Vrin, 1930）（1948年第二版）。该书给一些读者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以为作者是现象学的追随者，

而实际上，他对现象学是持批评态度的。

乔治·古尔维奇从不让自己待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他总是对政治的发展和重要的社会经验兴趣十足。因此，他曾经积极参与过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1917—1920年）的早期阶段和法国工会运动（French labor union movement）（1928—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0年）他作为战士参加了马其诺防线战役，还参加过反对德国统治的地下运动以及在美国的自由法国（*France Libre*）组织。从他重返法国时开始，他一直都参与工会运动。他倾向于一种基于工人自治（*autogestion ouvrière*）的去中心化的、多元的集体主义。^①1962年，他因为公开反对警方对阿尔及利亚示威者的暴行，而成为恐怖组织 O. A. S. 策划的恐怖主义谋刺的受害者。古尔维奇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社会学理论远非像它们看上去那样是图式性的，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被建立在关于社会实在的实际经历之上——它的形成、危机、变革等。

丰富的社会阅历、自身的政治倾向和深广的智识，使得古尔维奇对社会实在的极端复杂性极富敏感性。可以肯定，在20世纪的社会学中，乔治·古尔维奇是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人之一。他对社会实在的解释和大胆开拓，为他的学生留下了一座蕴藏丰富的“金矿”，等待着他们去进行更辛勤的探索。

《社会时间的频谱》（*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无论是就它的研究对象而言，还是作为古尔维奇一般理论框架的导论，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深度层面分析应用于社会时间，关注社会时间的多面向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社会框架。

深度层面分析（depth level analysis）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封闭、静态系统直接对立。它被设计成用来分析社会实在的开放的、永远处于进程和变化之中的生活剧。它指引着我们对复杂的、流动的、不断涌现出的社会实在作出现实的解释。它将社会实在看做一个整体，尽管它也允许

① 参见 *The Bill of Social Rights*, New York, 1946;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Vol. II 1963, pp. 452—461; *Le temps présent et l'idée du droit social*, Paris, Vrin, 1932, pp. 13—99, 213—295.

在动态变动中对其组成部分进行分析性研究。整体的社会实在十分复杂，因此，它往往容易被各种组成要素所淹没，后者往往相互冲突和矛盾。

社会学难以克服的内部困境在于，它能够给出的综合性的、一般化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得到经验的验证。社会学家们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一困境，有些社会学家作许许多多的限制，这样，概括的价值就没有了，还有一些则将他们自己限制在狭窄而有限的研究领域，使得他们自己说不出任何对社会真正重要的东西。但是，乔治·古尔维奇紧紧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将它视为社会学要达到科学上的成熟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应将这一研究路径误认为是属于业已过时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相反，古尔维奇设计深度层面分析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特殊的科学方法来替代传统方法，后者已经难以被用于分析社会实在的动态复杂性了。

对它的使用应该是实用主义的。在这一分析框架的指导下，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每一个领域都能得到深入检视。古尔维奇明确指出：“我的目标就是要表明，科学的社会学只能够是一种重构，是对进行中的、动态的整体社会生活的重构，尽管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每一种框架、情境之中，每一次危机、转折之际，都应该重新尝试一次重构，甚至每一种概念工具都需要更换或重新设计，而且它们只能发挥参照点的作用。重构的有效性必须在持续变化的试验中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得到证明。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超经验主义’（hyper-empiricism）的含义。根据这一概念，社会学能做的一切就是尝试重构，而且每次都要从特定的参照点开始，这些参照点更加适用于理解处于运动中的社会实在的预料不到的转向。”^①

尽管现象学的“悬置”（bracketing）看上去和古尔维奇的深度层面分析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处明显的不同。现象学试图“悬置”或者剥离连续的层面而直达体验的、有意图的意识之

① ‘Réponse à une critiqu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3 (1952) p. 103.

“本质”(essence),而古尔维奇是把层面分析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来使用的。借助这一概念化,我们将洞穿表面现象和客观化的社会数据,进而达到社会实在最深的、最隐晦的潜藏层。后者并不包含达到根本的、重要的基底的内涵。任何一个层面的相对重要性在于被研究的具体现象及其变化。

古尔维奇并不否认传统科学方法的作用或者有效性。他只是注意到,若以较为传统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实在的更深层次的,更为隐晦、却又极为重要的层面时会力不从心。因此,他提出了名为超经验辩证法(hyper-empirical dialectics)的这样一种方法。^①

超经验辩证法超越了传统的正题、反题和合题,因为它被理解成社会实在的运动,被理解成找出社会实在运动转折点的多种方法。具体说来,超经验辩证法包括以下几种方法:(1)互补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complementarity)。这种辩证法又包含四个方面:第一,相互掩藏的差异。它们看上去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却彼此包含。第二,并列的或者相互替代的差异。第三,相互补充的差异,如抽象与具体,肤浅与深刻等。第四,直接对立,如北极和南极,正极和负极等。(2)相互包含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mutual involvement)则是寻找那些初看上去对立,实际上却相互包含的关系,如身体与心灵或者精神领域与社会领域的二元性。(3)矛盾与含糊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被用来洞悉这样一些矛盾: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有吸引又有排斥,或者既舒适又有危险等。(4)极化辩证法(dialectics of polarization)是辩证法的经典形式,由正题、反题和合题构成。(5)视角互易(reciprocity of perspectives)是相互包含辩证法的强化形式,却被用于分析这样一些差异:其中的要素或关系的内在性极强,结果它们表现出并行或者对称。

古尔维奇强调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微观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交往或种种关系的表现,即被整体结合到整体之中的方式。尽管可能存在 $n+1$ 种社会交往的表现,但其中得到充分概念化的是教

① 参见‘Hyper-empirisme dialectique’,载于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5 (1953) 3—33。有关这一方法的最新和最完善的阐发,参见Dialectique et sociologie, Paris, Flammarion, 1962, pp. 189ff。

会 (Communion)、社区 (Community) 和群众关系 (mass relations)。它们反映了我们 (we-nesses) 的三种不同的强度。在群众交往中, 我们的融合是很弱的, 只是停留在表面, 不能触及更深的个人层次。在社区里, 关系整合发生在更深入、更亲密的层次上, 而教会则代表着最彻底的融合。教会中的关系是最强的, 最不会令人感到约束和压力。在这一连续的另一端, 大量的我们 (mass we-nesses) 最弱, 却会让人感到最大的压力。在教会中, 尽管其强度大, 但我们的融合使得个人和集体的愿望保持一致, 这正是人们不易感到压力的原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如战争、革命、罢工、天灾, 教会关系可能会在原本只是社区或者群众关系的群体中涌现。在特殊时刻, 任何一个群体都可能会展现出教会关系的形式, 或者降至社区或者群众关系的形式。^①

古尔维奇也认为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并且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利用社会关系计量学的检验 (sociometric testing) 和社会剧 (sociodrama) 来测量我们 (we-nesses) 的融合程度。他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具体而且切实可行的建议, 扩展了该领域的研究。^② 其重点围绕着我们 (we-nesses) 形成或瓦解的条件、关系的强度以及这些关系在符号层面和价值与态度层面上如何变化等。

宏观社会学研究群体和总体社会 (global societies), 每一个群体和社会都是微观社会要素或社会交往形式的集簇。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的这种差异, 允许我们对群体进行更富洞察力和解释性的分析。教会、社区和群众这三种社会交往形式同时内在于群体之中, 在特定时间或者社会境遇之中, 其中的某一种关系就会成为主要的。外部事件或反常情况, 如恐慌或者公然表明偏见等, 能够打乱三种社会交往形式的组合, 而使原本并不显现的某种社会交往形式成为主要的。

群体研究应该属于宏观社会学研究范畴, 它包括可被结构的和结构

① 比较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Vol. I, 3rd ed., 1963, pp. 119—181 和一则英文提示 ‘Mass, Community, d Commun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8 (1941) 485—496。

② 参见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op. cit.*, pp. 249—283 和英文的 ‘Micro-sociology’ in *Sociometry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Beacon House, 1950, pp. 25ff。

性的均衡。群体分类图式包括 15 个标准，如规模、持续程度、周期、分散程度、所追求的目标、接纳方式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图示，它对群体形成和群体运作的分析很有效，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敏锐的分析方法；它对知识社会学、道德生活和法律领域的问题的研究也是成果颇丰。最后，它对关于社会阶级的深刻的经验分析也颇有助益。^①

也可以根据微观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群体。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哪些群体会融合并形成我们关系？这种融合的程度如何？在什么社会情景下，群体结合会分裂，然后融合成新的结合关系？

宏观社会学还会分析总涵的或总体的社会（inclusive or global societies）及其结构。古尔维奇将总涵社会界定如下：（1）它们统驭其内部的所有部门和集体，并且有权判定所有功能群体的活动范围。后者包括这样的国家，它的政治统治总是相对的和从属性的。（2）总体社会不仅是可被结构的（structurable），也是被结构的（structured）。（3）总体社会是超功能性的（supra-functional），也就是说，它不能被简化为其群体、功能或目标的总和，其中任何一个组织，甚至是它们的总和，都不足以代表它。（4）然而，所有总体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组织化的，尽管有的只是雏形，有的已经发展完善。（5）总体社会分享并促发文明，但是这些文明并不相同。总体社会的种类要多于文明种类。文明是总体结构的黏合剂，并渗透其中。可以说，它们是总体社会的产物，却比后者持续更长久。在总体社会，其结构和文明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

划分总涵性社会结构的 8 个^②标准是：（1）其中各群体的等级制度；（2）社会交往形式的结合方式；（3）哪一个深度层面受到重视；（4）劳动分工和财富积累的方式；（5）社会控制的等级制度；（6）将总体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的文化产品；（7）财富规模。

在总涵性社会结构的概念和 8 个标准的基础上，古尔维奇区分了 14 种总涵社会。其中 4 种是古老或原始的社会结构：其一，主要以宗族模式组织起来的部落，但有着相当重要的家族关联（可以在澳大利亚和南

① 比较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op. cit.*, pp. 285—402 和 *Traité de sociologie*, 2nd ed., 1963, Vol. I, pp. 185—204 和 Vol. II, pp. 103—206。

② 这里的数字可能有误，后面只列了 7 个方面。——译者注。

美印第安人那里发现它们)。其二,结合了多个群体的部落,它们由一个拥有宗教权力的首领统治(可以在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找到它们)。其三,拥有军队、大家族以及宗族分支的部落(可以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找到它们)。其四,是这样一些部落,它们的家族分支被组织到君主统治体制中,区域群体支配着其他许多群体,而且这些部落中还有神创论和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这些神话直接影响了社会结构(可以在北美找到它们)。

存在 6 种历史的社会结构类型: (1) 克里斯马式的神权政体(Charismatic Theocracies)(例如,古埃及); (2) 族长制社会(例如,旧约中描述的那种社会以及日耳曼人的族长制度); (3) 封建社会(存在于 10 世纪到 14 世纪的欧洲); (4) 城邦(City-States)(例如,公元前 5 世纪到 1 世纪的古希腊城邦以及古罗马的公民社会); (5) 初期资本主义社会; (6) 发达的竞争资本主义(它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主导了整个欧洲)。

4 种当代社会是: (1) 发达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 技术科层制的法西斯社会(1922 年到 1944 年的意大利以及 1933 年到 1945 年的德国); (3) 国家集体主义(1917 年以来的苏联和 1949 年以来的中国); (4) 工业民主与政治民主协调并存的多元集体主义(最后这种类型至今未能实现,但是古尔维奇认为它在南斯拉夫已经初见端倪,苏联也可能逐渐向这个方向演变,而且有迹象表明,英国和瑞典也有可能走向这种类型)。^①

根据上述 8 个标准区分这些类型,有助于分析影响社会结构的各种力量,采用深度层面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深度层面分析并不只限于总体社会,还可以用于群体以及各种社会交往形式的分析。它是乔治·古尔维奇理论框架的关键要素之一。

深度层面的划分只是出于分析的目的。实际上,它们互相渗透,彼此影响。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就是某些层面得到重视的程度——需要以具体的社会现象为依据。

① 参见 *Déterminismes sociaux et liberté humai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nd ed., 1963, pp. 244—324 以及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op. cit.*, Vol. I, pp. 447, 507; Vol. II, pp. 434—461.

我们可以将这些深度层面以大纲的形式描述如下。

(1) 生态表层(*ecological surface*)包括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地理因素,如气候、地势和土壤质量。这些因素限制了社会领域,同时也渗透着社会性。如果没有其他层面,如集体价值和态度、符号、规范等,技术方面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更谈不上使用。人口统计数据,如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以及国家间和城乡间的人口迁徙,都是生态表层的数据。文明的物质要素,如建筑、道路以及通讯方式,都要在这个层面上研究。这些方面的东西很容易通过观察、计数以及统计操作获得。还有一些项目对于理解社会实在很重要,但并非决定性要素。很显然,当我们试图确定最优人口数量的时候,必须考虑价值和态度,以及人口数量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层面被作为第一层,但是,它只有在可以被观察到的情况下才最先得到考虑。

(2) 在组织层面(*organizational level*)上,集体行为是以预先确定的规则而事先确定的,它们是稳定的、等级化的和中心化的。组织为个人和群体设置了外部限制,但不能将它与社会结构相混淆。^①与较为松散的生态表层相比,组织层面更富流动性和活力,也更加正式,更加具有制约力。组织刚性水平也有不同。民主组织比专制组织更加灵活,对其他层面也更为开放。组织僵化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组织对它下面的层面的开放程度以及与这些层面之间相互渗透的程度,还要取决于是神秘主义的特征还是理性特征主导。规模也很重要,因为随着总体规模的增加,组织倾向于更加僵化和非人性化。

许多群体依然是无组织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如社会阶级,所以,如果仅仅依据组织形式来区分群体和总体社会,它们就会被遗漏。我们往往会认为组织具有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技术和组织越发地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在政府、军队、警察,甚至政治党派等科层制组织中都有所体现。实际上,组织形式对于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影响。一种具有等级制度的、集中化的组织形式

① 参见 ‘Le concept de structure social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9 (1955) 3—44 以及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op. cit.*, Vol. I, pp. 403—446.